

关于 1936 年郁达夫访日

寇 振 锋

1 引言

郁达夫于 1936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19 日期间曾经访问过日本。但是恐怕由于资料所限，关于此次访日的先行研究还极其少见。对于此次访日，如《读卖新闻》《都新闻》《时事新报》《中国文学月报》等当时日本较有影响的媒体对访日中郁达夫的报道至少有十八次之多，由此可以窥知日本民间对郁达夫访日的关心程度。虽然日本研究者对于此次访日行程的考证相对较详一些¹，然而有关访日的背后因素及其相关问题迄今仍未得到确切考证。

最近，笔者发现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新公开的关于郁达夫 1936 年访日时的一些档案文件，这些文件资料都是以胶片形式保存的，相关文件多达一百余拍，二百页之多，其中包括许多当时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对于研究郁达夫来说无疑是最有力最详实的第一手宝贵资料。笔者将通过目前所掌握的这些第一手资料进一步探究和梳理郁达夫访日时鲜为人知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访日一事的提起、日方邀请郁达夫的理由、同行人员、访日经费的由来、警视总监所见的访日行程、在日演讲等等。从中亦可窥见身在日本的郁达夫继续为祖国伸张正义，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嘴脸的同时痛斥汉奸卖国贼，表现出了他那作为一个爱国主义作家所具有的强烈的正义感。但愿通过本文的考证，能够为郁达夫研究乃至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2 访日一事的提起

关于郁达夫访日一事的提起，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1936 年的冬日，南京侍从室何廉奉蒋介石之命打了一个电报给福州的陈主席。电文大意是：叫郁达夫到日本去一次，去到东京和郭沫若谈谈，要叫郭沫若回国来，……。”²如果我们据此证言似乎可以推测，郁达夫访日是由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派。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郁达夫访日是由日方首先提出来的。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欲派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的郁达夫前往台湾考察，日本驻福州总领事馆总领事中村丰一得知

此事后希望让郁达夫顺便访问日本。我们通过中村于当年4月20日给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手写的机密第158号便可知其中原委：

本省主席陈仪自就任以来，省政府各厅极力采用留日出身人士，且有继续采用的意向。此地欧美派尤其在青年中的影响仍牢不可破，欧美诸国的多数教育机构在当地均已出现。鉴于这种迫不得已之现状，陈仪对此亦颇表示关心，现已聘任其同乡中国著名学者郁达夫为本省参议，欲从文学方面试图加深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另外，最近还有意派郁达夫赴台湾方面考察，但由于经费原因未能成行。如您所知，此人经历如《现代中国人名鉴》所载，为日本帝大出身，最近在任浙江大学教授的同时又主编《论语》，现在为每号《宇风》（实为《宇宙风》——笔者注）（上海杂志）寄稿，在中国青年中有相当多的崇拜者。故趁其视察台湾之际使其视察日本，这对于日中亲善应该比较适合，且亦奏效。³

有田在接到机密158号两周后即回复中村，表示同意邀请郁达夫访日⁴。与此同时，外务省着手操作此事，而且在当月底就已为郁达夫访日做出了经费预算⁵。然而，中村收到回复时，偏巧郁达夫暂回杭州，访日一事只好等到其返回福州后才能确定。据一个半月后中村给有田的机密第264号可知访日一事已基本敲定。

本官在与陈主席面谈时，称赞陈主席将郁达夫请至本地之举。（请参照4月20日致阁下机密第158号）。本官直接提议，委托文化事业部给予资助，派遣郁达夫视察日本台湾如何？陈仪甚是赞成，并感谢本官之好意。郁达夫数日前已归福建，陈主席将意向转达过去并试探其意，此人亦甚悦，并感谢文化事业部之厚意，期待今秋适时访日。⁶

据机密264号还可知，中村原打算以《闽报》馆特派的形式邀请郁达夫访日，但由于《闽报》记者郭寒民加入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涉嫌参加颠覆福建省政府活动而被当地公安局逮捕。因此，中村的原计划被迫取消。

再者，从时间上也可推断出郁达夫访日为日方所邀。认为访日是由国民政府所派之说，有的说时间是在当年的冬季⁷，有的说是夏秋之交⁸。其实，如上所述，早在当年4月日方就已酝酿此事。郁达夫是5月底返回福州的⁹，因此，起码在5月底至中村发出机密264号的6月24日这段期间，郁达夫就已接受了日方的邀请。显然是日方邀请在先，国民党授意在后。

综上,可以说,郁达夫访日首先由日方提出并征得陈仪及郁达夫同意之后才开始操作的,而且邀请方也是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即使南京政府赋予了一定的使命,但访日一事并非南京政府首先提起的。

3 日本邀请郁达夫访日的理由

虽然在郁达夫访日之前日方已邀请过多人,但日本为何要主动提出邀请郁达夫访日?笔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进行综合考证后,可归纳出如下几种原因:

其一,邀请郁达夫访日实为当时日本政府对华实施的所谓对华文化事业这一文化外交政策上的一环。

所谓的对华文化事业指的又是什么?这还得缘于1901年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对八国联军的赔偿问题。对于庚子赔款如何使用,日本政府在1923年的《关于对华文化事业阁议案》中提出:“用团匪赔偿金的收入,增设一种特别款项,主要以日中亲善为目的,用其充当中国人的文化事业基金。”¹⁰在同年实施的《追加对华文化事业实施纲要》这一文件里,在原有十项对华文化事业实施纲领的基础上又追加两项:一是“促进日中间名人的交流和演讲。”一是“为视察我国教育及其他设施的个人或团体予以资助,为视察提供便利。”¹¹另外,同年还制定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将其后的庚子赔款等中国赔偿金用于对华文化事业。日本外务省在1936年批准的秘密文件《关于对华文化事业演讲视察费之件》中曾明确指出:

中国过去数年的反日态度最近明显缓和,特别是由于南京政府表明亲日政策,日中关系渐趋好转,此乃实情。文化事业部在遵从原有目标的同时,顺应时势之变化,基于现实效果之考虑,对于过去的对满华文化事业尤其是对华文化事业的做法予以更改。¹²

由于日本政府过去对于日本人视察中国的费用支出过多,为了改变两国视察者往来人数的偏差,积极支持中国人访日,扩大补助金额,要将演讲视察预算总额的“三分之二充当中国人(含满洲人)的访日费用。”¹³《关于对华文化事业演讲视察费之件》这一文件就是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执行上的参考基准。

时隔不久,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发布第402号机密《关于对满华人资助演讲视察费之件》¹⁴,正式向驻华使领馆发布新更改的对来文化事业方针。首先,按地区划分了中国人视察日本时的补助标准;其次,规定了资助演讲视察人员的先后顺序;另外,还规定,在资助演讲视察

人员中，留日出身者要占六成。在注意事项上还规定，演讲视察费要在本人抵京，并经批准后才予以支付，本人抵京后应立即到外务省领取。而且，外务省还要求各使领馆随时报告来访者回国后的感想及其行动，若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要将原文及译文一同上报给外务省。

广田签发的第 402 号机密被发送到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领事馆等五十七个外交机构¹⁵。而且中村就是依据此号机密文件，在机密 158 号中向外务省提出邀请郁达夫访日的。

再有，日本政府也明知郁达夫是具有左翼思想的作家，而且他在 1936 年 6 月《论语》第 89 期上还发表了《战争与和平》一文，力主反对言和，要“来一个战的尝试”，并批评中国人退让的弱点¹⁶。对此，中村应该清楚，但为何还要执意邀请呢？因为日本政府对华文化事业政策中明确规定，不仅邀请亲日的，而且还邀请反日的。这一政策，通过日本政府资助访日人员的先后顺序便可知晓，日本政府规定可提供资助的人员中包括以下人员：“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回国后多年未来过本邦者；中国学界的著名学者；带有排日色彩，但若视察了解本邦后可转变反日态度者。”¹⁷显然，郁达夫正好符合他们的条件，换言之，日本政府对郁达夫左翼思想的转变抱有极大的幻想与期待。

总之，可以肯定，邀请郁达夫访日是日本政府所制定的对华文化事业政策上的一环。

其二，由于郁达夫名声显赫。早在 1930 年 7 月，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领事重光葵向外务省汇报的文件中，郁达夫及其主编的《大众文艺》就在其中¹⁸。

另据驻杭州领事馆代理松村雄茂于 1935 年 10 月给广田的机密第 278 号《关于人物调查之件》中写道：“本件为遵照昭和 10 年（1935 年——笔者注）9 月 20 日报三机密合第 1694 号贵函所指示的调查本馆所辖中国要人之件，调查表如另纸所附，敬请查阅。”名单中列出了浙江省各界要人共十六人的简历，郁达夫就列于其中：

著述家，四十一岁，浙江省富阳县人。日本帝国大学文科出身，原北平大学教授，高中时期立志学医后转文科。作为小说家负有盛名，因一时的左倾思想受到当局监视而沉静下来，只好改名换姓地向中国杂志投寄杂文或小说。¹⁹

由上可知，郁达夫之名在日本外务省早已挂号。中村在机密 158 号中就曾特别强调郁达夫在中国青年中有相当多的崇拜者，而且外务省在正式批准郁达夫访日的文件中，主要是在强调郁达夫能够从文学方面加深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以及郁达夫在中国的崇拜者之多。

那么，日本欲如何通过郁达夫来加深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呢？当然，就是借郁达夫之

名来宣传日本。中村在机密 158 号中要求外务省让郁达夫把访日旅行记及其日本通信等寄给日本人在福建经营的《闽报》。中村同时还寄给有田一本郁达夫的新作《达夫游记》供参考。可见，如果像郁达夫这样的名人写日本见闻或游记，宣传日本，再向日本人经营的《闽报》投稿，这其中所带来的宣传效果无疑是显著的。

因此，日本主动邀请郁达夫，无疑是看中了他的显赫之名，想利用他在青年中的巨大影响力来宣传日本，努力使其成为所谓日中亲善的标榜人物。

其三，由于郁达夫是留日人士且与亲日派陈仪关系密切。陈仪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后，重视留日人士。陈仪与郁达夫都曾留日，又是同乡。这对于日本来说，培养亲日派，郁达夫无疑是最佳目标。而且当时郁达夫又是福建省政府参议，不久又被委任为公报室主任，也可以说是政府要员，必将成为日本关注的重点对象。另外，日本也极为看重福建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如中村在给有田的机密第 223 号中写道：“一般认为福建省对于我国来说，具有特殊的地域关系。然而，日本的文化设施极其匮乏，欧美人经营的医院、学校以及其它文化设施绝对凌驾于我方之上。”²⁰ 因此，鉴于福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日本才会担心其在福建的势力会消弱，必然要重视福建省政府的对日关系。拉拢福建省政府要员，笼络有留日背景人士，这无疑是一种投资、一项长远战略。

总之，日本政府就是鉴于上述三种理由才极力邀请具有左翼思想的郁达夫访日的。这些理由完全是出于日本政府自身的政治目的，邀请郁达夫表面上是以日中亲善为幌子，实则是一种利用与拉拢，甚至背后隐藏着一定的阴谋。

4 郁达夫的访日目的及同行人员

从中方的立场来看，郁达夫的访日目的，一般认为有两个：一个是肩负有请郭沫若回国的使命²¹；一个是购买印刷机。关于第二个目的，有人明确指出是购买日本《北海时报》的轮转印刷机²²，此说是否准确，暂时在外务省的文件中还未发现。

但有一种情况值得关注。早在 1935 年 12 月，中村就曾致信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文化第一科科长林安，提议赠给筹建中的福建省立医院一台深部治疗用透视仪²³，但遭到林安拒绝²⁴，中村又致信文化第二科科长宫崎中郎²⁵。显然中村的坚持最终没有白费，因为内田二郎调任福州总领事馆总领事后，在公第 396 号中指出，与郁达夫同行的黄丙丁“有接受文化事业部赠给福建省立医院 X 光透视器械的任务。”²⁶ 可见，在郁黄二人赴日前，捐赠一事已基本确定下来，正式批文是在郁黄二人已到日本的 12 月 8 日下达的。文件规定，从 1936 年度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事业费当中拨出八千日元，在此额度内购买一台 X 光透视仪赠给福建省立医院

因此，二人在访日前必然清楚医疗器械一事。另外，所赠的医疗器械也并非计划由他们二人直接带回，而是由外务省委托运输公司代办。作为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的郁达夫完全可以代表省政府商讨此事。于是，笔者猜测，所谓的印刷机很有可能就是X光透视仪。

另据外务省现存资料还可知，为了捐赠X光透视仪，外务省与厂家的交涉及所签订的合同，以及与船运公司所签的运输合同、器械及运输保险合同等等，相关文件多达二百四十余页²⁸。然而，由于不久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外务省解除了于1937年5月与厂家所签订的购买X光透视仪协议²⁹。显然，外务省向福建省立医院捐赠的医疗器械一事最终不了了之了。

当然，郁达夫访日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目的。他在演讲时曾这样提到：“兄弟已经十几年没到日本了，这次来是想看看日本最近进步及许多老朋友们。出发前与鲁迅先生约好同来，可是临行时他已经是了不行了。”³⁰如果能够重游他那曾经渡过九年留学生涯且已分别十四载的国度，怎能不是一种愿望，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且，郁达夫在日本还有广泛的人脉，与日本的政界、文化界、军界都有交往。能够故地重游，重逢旧友，这大概也是他欣然接受日方邀请的原因之一吧。他在给王映霞的信中曾这样流露出访问京都时的心情：“将近二十年的久别，这回见了，心里的确也感到不少的愉快。”³¹

另外，郁达夫访日应该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充分利用此访日之机，在日本各界主张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进而提出他那反战的左翼思想，并揭露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对此，通过日本警方禁止郁达夫演讲一事，我们便可以发现他内心所怀揣的这一极具正义感的政治目的。

在此，笔者还要考证一点，那就是郁达夫访日时是否有人同行，对此迄今还未有人提及。笔者在上面已多少涉及，根据最新资料考证，与郁达夫的同行人是留日医学博士黄丙丁。郁黄二人在福建时就交往密切，据说二人还常用日语交流³²。黄丙丁是福建人，1928年在南满医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手、讲师，后又到日本的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初任医学部助手，由于成绩优异，后被破格选拔为国费留学生，每月获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一百日元的学费资助³³。1933年获医学博士称号，1934年回国³⁴。

黄丙丁的访日目的与郁达夫不同，他访日时的身份是福建省立医院筹备处主任，医院建成后将任首任院长，此行是为了考察日本视察医疗设施方面，为筹建医院作参考。在访日过程中，他的足迹遍及日本的东北、关东、中部、北陆、关西、九州等诸多地区。若仅就外务省为其开具的介绍信来看，他所视察的医院、研究所、医疗器械商店以及制药厂等多达二十处³⁵。

另据机密 223 号可知,黄丙丁与陈仪的关系非常密切:“黄博士不仅深得陈仪的信任,而且从职业上讲又与省政府高层接触密切,因此本官希望将来通过此人收集各种情报。”³⁶由此可见,日本政府邀请黄丙丁以及协助福建省立医院筹备医疗设备,还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那就是为了将来的情报收集。

下面再看郁黄二人的同行情况。如后所述的警视厅总监所见的访日行程一样,郁达夫与黄丙丁二人同时从上海出发,二人到达长崎第二天便乘火车抵达东京,同住东京的万平宾馆。第三天,二人拜访了中华留学生监督处和驻日民国大使馆武官署,还参拜了明治神宫并在市内外观光。第四天,二人访问外务省,委托协调访问视察事宜。第五天,二人由万平宾馆搬至茗溪会馆。可见,二人访日时最初的行程基本相同。

但是,黄丙丁是否与郁达夫同去台湾并一起回国,未发现有确切记载,外务省为郁达夫访台所开具的介绍信上也未提黄丙丁³⁷。然而,据警视厅的监视报告可知,黄丙丁打算经台湾回厦门³⁸。另外,通过黄丙丁回国后所寄信件可以发现,黄丙丁在视察日本后途经台湾,并于年底返回中国的³⁹,这与郁达夫 12 月 30 日回国的行程及时间应该吻合。可见,由于二人的访日目的不同,除了中间一部分行程不同外,前后行程应该是一致的。因此,说黄丙丁是郁达夫访日时的同行人也未尝不可。

5 访日经费的由来

关于郁达夫的访日经费问题,有的说是南京政府为郁达夫拨发了二百元治装费⁴⁰,有的说是数百元⁴¹;还有的说是接受了日方谢礼二千日元⁴²。孙百刚曾对二百元之说表示怀疑,又对二千日元谢礼之说表示证据不足⁴³。另外,针对二千日元的报道,日本人一户务曾问过访日时的郁达夫,郁达夫对于二千日元谢礼之说给予了否定⁴⁴。此次访日是否受到了南京政府的资助,暂且不论。但经笔者考证,郁达夫此次访日的确获得了日本外务省的资助,不过资助的金额并非二千日元,而是一千日元。

在机密 158 号中,中村提出邀请郁达夫访日的同时并要求外务省提供高额资助:“遵照 3 月 28 日文化事业机密合第 402 号《关于对满华人资助演讲视察费之件》,请文化事业部支付一千日元的高额视察补助费为盼。”⁴⁵外务省随即同意支付一千日元的视察补助费,并指示人到东京后交付本人⁴⁶。同时,已为郁达夫做出了一千日元的预算。

为何说日本政府为郁达夫提供了“高额资助”,原因有二。其一,中村所依据的机密 402 号中所附的《改正纲要》规定:“给予中国南部,福州以南各地来我邦视察者,每人支付补助金在四百至五百日元范围之间。”如同行的黄丙丁就是五百日元。四川一带最多,但也不超过

六百日元。不过该方案同时规定几种例外：“为前显官、就要职或著名人物不以上述各项为依据，按其身份而自行裁定支付额度。”⁴⁷显然，郁达夫就属于此类不受限制人员。另外，文件中所规定的日本人视察中国时的最高补助也仅为五百日元，然而却为郁达夫提供一千日元的资助，不可不谓高额。

其二，在于资助金额远远高于当时日本人的平均收入。据统计，在郁达夫访日的1936年，整个日本的日平均工资仅为一日元三十五钱⁴⁸。那么一个月按三十天来计算，月平均工资仅为四十日元零五钱，那么一千日元至少相当于当时日本人两年的平均工资。计划两个月的访日行程，得到的却是相当于日本人两年工资的资助。

综上，日本外务省为郁达夫访日提供资助的额度之高可想而知。大概也正因此，郁达夫在东京访问时对郭沫若及其全家花钱豪爽大方，而令郭沫若感激的吧⁴⁹。

为郁达夫提供一千日元资助的正式文件，起草于10月28日，五天后的11月2日正式批准。上面除了外务次官、文化事业部部长、文化第一科科长、第二科科长的亲笔签字外，还有会计科长的、负责收入支出的、负责检查的、负责出纳的等各类公私戳多达十五个。文件中同时要求，补助金需要本人到外务省领取⁵⁰。可见，郁黄二人去外务省时应该领取了补助金，因为外务省当年的“演讲及视察费”财务列表中，二人的费用均在已支付之列⁵¹。

那么，这项经费又出自何处？如前所述，邀请郁达夫访日是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一环，而且日方邀请郁黄二人就是根据机密第402号而裁定的，此号机密是对华文化事业中一项重要文件，规定用庚子赔款等中国赔偿金，增加两国间视察者的人数，尤其支持中国人视察日本。而且，正式批准支付郁黄二人补助费的文件上都印有“对华文化事业费 演讲视察费”字样⁵²。因此，郁达夫以及黄丙丁的访日费用实际出自庚子赔款等中国赔偿金。

6 警视总监所见郁达夫访日行程

由于郁达夫的名声很大，其影响及号召力自然不可小视。这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既是利用的大好机会，又必须监视其行踪。

郁黄二人于11月12日乘日本的“上海丸”在长崎上陆，第二天即乘铁路赶往东京。对此，长崎县知事田中广太郎在第二天即向上级汇报道：

据称此次是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邀请，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视察学校、图书馆及文化设施方面，并就中国的文化、哲学、文学进行演讲。持有驻福州日本官宪给文化事业部及其它相关部门的介绍信。并无特别可疑之处。即日乘铁路前往东京。⁵³

可见，田中是应日本政府的指示而监视的。文件上报给了内务大臣潮惠之辅、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以及警视总监、神奈川、大阪、兵库、山口、福冈各厅府县长官。另外，田中报告中并未提及同行的黄丙丁，可见监视的重点对象无疑是郁达夫。

在二人抵达东京后，随即进入日本警视厅的监视视线。警视厅总监石田馨为此上报过四次监视报告，四次均上报给了内务大臣潮惠之辅、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等高官，另外还主要包括驻上海内务书记官、东京刑事地方裁判所检察官、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长，以及北海道、爱知、京都、神奈川、大阪、兵库、山口、福冈等多个厅府县知事。显然，监视报告是为了日本政府内部以及相关各厅县之间相互沟通信息，及时通报有关郁达夫的动静，以便掌握其行踪。据石田的监视报告可知郁黄二人的大致访日行程如下：

11月13日下午3点25分，二人抵达东京站，直接投宿万平宾馆。

11月15日，拜访中华留日学生监督处和驻日民国大使馆武官署，还参拜了明治神宫并在市内外观光。

11月16日，郁达夫访问会见了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

11月17日，二人访问外务省，委托协调访问视察事宜。其后，郁达夫视察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馆；黄丙丁视察了庆应大学附属医院。

11月18日，二人由万平宾馆搬至茗溪会馆。此时二人的计划如下：黄丙丁计划本月20日傍晚在上野站乘车去仙台，逗留十天左右，访问母校东北大学医学部等，回京后视察东京帝国大学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和泉桥医院、顺天堂医院、北里研究所等。为正在建设中的福建省立医院寻找参考资料，还准备购买医疗器械等。郁打算在12月2日和文士佐藤春夫一起召集在京中国留学生（时间场所未定），佐藤就日本文坛的现状，郁就中国文坛现状进行演讲。其后日程未定。但还希望会见前朝鲜总督宇垣一成、陆军大将松井石根、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等人。

11月26日下午，出席东亚同文会在霞山会馆举办的午餐会，以《关于中国之现状》为题演讲。出席者有本多熊太郎、太田宇之助、五百木良三、大竹贯一、高桥雄豺、八角三郎、古岛一雄、有贺长文、赤池浓、木村锐市、菊池武夫等计七十五人。

12月2日下午4点至5点30分，在日华学会楼上举行了中华留日学生学术演讲会，听众为中国留学生约五百人。佐藤春夫和郁达夫分别就《日本文坛的流派及其批评》和《现代中国文坛之概况》进行了演讲。郁达夫的演讲有煽动反日言论，正密切监视中。

12月5日下午2点,出席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日华学会三楼讲堂举办的演讲会,欲为竹内好等十三个出席者做《中国诗的变迁》的演讲,鉴于12月2日的演讲中有反日煽动内容,郁达夫接受了研究会主要负责人高桥君平的善意劝告,取消了此次演讲。

12月13日下午2点,预计出席中华留日明治大学校友会举办的第二次学术演讲会,做《文学的时代性》的演讲。

12月15日下午6点,出席大亚细亚协会干事中谷武世举办的座谈会。

12月16日下午6点,出席日本笔俱乐部的招待晚餐会。

12月17日上午9点,从东京站坐火车前往京都。途中参观京都、奈良,并赴台湾访问台湾总督府坂本外事科长,由此人安排,在当地就中国的现状等进行演讲,预计明年1月10日左右回国。⁵⁴

上述通过四次监视报告而整理出的日程,可以弥补现有郁达夫访日行程资料上的不足。总的来看,访问个人几乎未上报。虽然石田在第一次报告中称郁达夫与左翼作家郭沫若等有深交,正严密注意其行动,但若与郁达夫年谱⁵⁵对照,可发现日方的监视并非是形影不离,如郁达夫与郭沫若见面、三次访问郭沫若住所,以及与郭沫若访问《大公报》特派员于立忱等行踪,均未上报。可以推断,日本警方主要针对的应该是公开场合的演讲集会。另据监视报告还可知,与郁达夫接触密切的日本人似乎也是监视对象,比如出席郁达夫演讲会的日本人的名字,以及佐藤春夫的演讲概要等也被列入监视报告之中。

通过日本对郁达夫的监视,可以发现日本政府的矛盾心理。既希望郁达夫访日,并邀请他演讲,但又疑心重重,担心他发表反日言论、散布反战的左翼思想。然而,日本政府所担心的事情却恰恰发生了。因为郁达夫在公开演讲时恰恰是在极力呼吁两国人民友好,反对侵略。

7 郁达夫在日演讲问题

郁达夫的演讲也是由外务省首先提出并出面予以沟通和安排的。据机密264号可知,郁达夫在接受邀请时就已答应了中村提出的在日演讲的请求⁵⁶。不久,中村在给宫崎的信中再次提到:“本官委托其抵日后演讲一事,得到爽快答应。待其到外务省之时,请予以引见,并尽量提供便利为盼。”⁵⁷已调任广东总领事馆的中村在郁达夫访日临近之际,再次叮嘱宫崎要提前安排好演讲场所等事宜⁵⁸。

可见,所谓的演讲是应日方社团邀请之说,实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背后予以沟通、协

调和安排的。同时，足以及证日方对郁达夫演讲的重视程度。

尽管如此，郁达夫在日演讲却遭到禁止。对此多有提及，但究竟是哪篇演讲稿出了“问题”？日本研究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文坛概况》⁵⁹，这与石田监视报告及《日华学会二十年史》中所提到的郁达夫演讲题目基本一致⁶⁰。可以看出，当时在宣传时很可能打出的就是这一题目。但经笔者查阅监视报告中所附的郁达夫的演讲稿全文可知，题目实为《中国文坛之现状》，这也是郁达夫在演讲中所说的。关于此篇演讲稿的内容迄今尚未有人提及，为笔者首次发现⁶¹。那么演讲中究竟有何“问题”？通过石田上报的郁达夫演讲概要可知原委：

中国今日的文学是抗日排日的文学，只要中国国民不是卖国贼，反日抗日是当然的。满洲已被夺去，华北即将失去，中国的无产阶级知识阶级受国民党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一般文学家受此压迫出路被堵塞，要比日本文学家的境遇困难，必须靠我们的努力开创未来。⁶²

但笔者发现，其实石田上报的概要与郁达夫的演讲稿有出入。在演讲稿中，郁达夫并未激化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而是在主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几天有日本朋友问我：‘现在中国的文学完全是排日抗日的文学吧’？我回答说：‘文人若有那种狭隘的思想，便不能成为文人了，中国文学并不一定抗日，假若美国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美。英国侵略我们，我们也要抗英。那一个国家侵略我们。我们就要排斥那一个国家’。”⁶³言外之意就是对激化两国人民之间的言论表示不满，并指出反抗的理由完全是在侵略的前提下而论的，没有侵略也就谈不上反抗。另外，此观点与一周前郁达夫用日语进行的《中国的现状》的演讲中的“认为全体中国人民都是排日论者，或者都是共产主义者，这是日本人一部分的偏见，说来也是错误的。”⁶⁴的观点相同，而且还与抗战爆发后发表的《日语播音的宣传要点》一文中“所谓的排日、侮日、抗日等等，都是军阀的逆宣传，想把我们对他们军阀所取的态度转移到你们民众身上去”⁶⁵的观点基本一致。归根结底，郁达夫在一贯主张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与军国主义区别开来，反对将两者混为一谈，并反对激化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当然，主要“问题”还是在于，郁达夫在此次演讲中不仅明确地指出了应该反抗侵略的事实：“当一个国家受到外力侵略的时候，必促成其国民团结一致，是一定的现象。”而且，他还痛斥了汉奸的卖国行为，呼吁在创作中要描写出来：“有许多人在当汉奸，许多人在卖国，还有许多人在干着连卖国汉奸都不如的勾当，这些都应该描写出来。”⁶⁶这两声铿锵有力的呐喊，在日本各界及留学生中间无疑具有强烈反响，引起了共鸣。当然，这对于日本军国主义

者来说无疑是一顿棒喝，无疑深深地刺痛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软肋。

于是，此次演讲即被日本警视厅定性为有煽动反日言论，其后在中国文学研究会例会上准备演讲《中国诗的变迁》遭到禁止。此后，郁达夫出席过座谈会、笔会等一些活动，虽有演讲计划，但未提是否进行演讲一事。因此，郁达夫自遭到禁止后很可能未再进行公开演讲，也就是说可能只做了两场演讲。

从“问题”演讲可以看出，郁达夫虽受日方重金所邀，但丝毫不为其所动，在国家危难之际，继续为祖国伸张正义，坚决反对侵略，痛斥汉奸的卖国行为。总之，这些言论无疑表现出了郁达夫他那爱国文人的赤子之心。

8 结语

本文通过笔者在日本新发现的有关郁达夫 1936 年访日时的一些珍贵档案资料，进一步考证了郁达夫访日的背后因素及其相关问题，无疑弥补了过去对于郁达夫访日研究上的欠缺和不足。

综观郁达夫访日的整个过程，日本邀请郁达夫访日，无疑是出于本国的政治利益。但是，此次访日的确获得了日本外务省的大力支持，不仅为郁达夫提供高额资助，还为其开具视察介绍信，提供各种便利。若没有日本政府的支持，他的访日活动恐怕难以成行。但是，日本政府对于郁达夫访日所抱有的能够转变其左翼思想的幻想和期待却未能如愿以偿。虽然日本希望郁达夫向日本人经营的《闽报》投稿，但迄今未发现郁达夫回国后的文章出现在《闽报》之上。高额的访日费用虽为日方所出，但却丝毫改变不了郁达夫他那为祖国伸张正义的拳拳爱国心，反而是借助演讲之机，与日本军国主义高唱反调，主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宣传反战思想。

另外，郁达夫通过此次访问，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有了更深刻地认识：“日本自从患了那不可救药的侵略症之后，简直疯了，他们备战很急，日常的一切设施尽都军事化起来。”⁶⁷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的郁达夫回国后即刻撰文警告国人：“民族的中兴，国家的再造，就要看我们这一年内的努力如何！亲爱的众同胞，现在决不是酣歌宴舞的时候！”⁶⁸可见，此次访日不但未使郁达夫反战的左翼思想有任何动摇，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而且言论也更加猛烈，以至于当时的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郁达夫是“抗日派文化斗士”⁶⁹。

总之，郁达夫此次访日的言论与行动，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虽然他那正义的反战之声在侵略舆论的笼罩下的日本毕竟显得微弱，但足以代表了当时广大中国人民的反战心声，他

の言行不失为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伟大作家。

注

- 1 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鈴木正夫編『郁達夫資料補編』(上),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 1973 年, 第 55-56、99-112 頁;『郁達夫資料総目録附年譜』(下),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 1990 年, 第 261-262 頁。
- 2 王映霞:《半生杂记》, 引自郭文友《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第 1408 頁。另外, 郁云著:《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第 137 頁)、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蒋增福编:《众说郁达夫》,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第 356 頁)等也均持类似观点。
- 3 「機密第 158 号・中国人ニ対スル視察費補給ニ関スル件」1936 年 4 月 20 日,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支那学者 郁達夫』(B05015770000), 第 8-9 拍。
- 4 「電送第 6896 号・支那学者郁達夫ニ対シ本邦視察手当補給ニ関スル件」1936 年 5 月 8 日, 『支那学者 郁達夫』, 第 7 拍。
- 5 「昭和十一年度講演及視察費(昭和十一年五月末調)」, JACAR『昭和十一年度 分割 1』(B05015099600), 第 23 拍。
- 6 「機密第 264 号・中国人ニ対スル視察費補給ニ関スル件」1936 年 6 月 24, 『支那学者 郁達夫』, 第 5 拍。
- 7 前掲《半生杂记》, 《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 第 1408 頁。
- 8 前掲《我与达夫共事》, 《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 第 1407 頁。
- 9 前掲《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 第 1397 頁。
- 10 「対支文化事業ニ関スル閣議案」1923 年, JACAR『文化事業部関係 自大正十二年 至昭和四年 (1) 大正十二年文化事業』(B05015000400), 第 2 拍。
- 11 「対支文化事業実施綱要追加」1923 年, JACAR『文化事業部関係 自大正十二年 至昭和四年 (1) 大正十二年文化事業』(B05015000400), 第 6 拍。
- 12 「対支文化事業講演視察費ニ関スル件」1936 年 3 月 5 日, JACAR『満支人ニ対スル講演視察費補給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一年三月』(B05015655900), 第 14 拍。
- 13 同上注, 第 15 拍。
- 14 「文化機密合第 402 号・満支人ニ対スル講演視察費補給ニ関スル件」1936 年 3 月 28 日, 『満支人ニ対スル講演視察費補給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一年三月』, 第 2-25 拍。
- 15 同上注, 第 2 拍。
- 16 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 8 卷,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 237-239 頁。
- 17 前掲「文化機密合第 402 号」, 『満支人ニ対スル講演視察費補給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一年三月』, 第 24 拍。
- 18 「中国革命互済会ノ外国語雑誌刊行計画ニ関スル件」1930 年 7 月 11 日, JACAR『共産党宣伝関係 雑件/対日宣伝関係 第三卷』(B02030938800), 第 15 拍。
- 19 「機密第 278 号・人物調査ニ関スル件」1935 年 10 月 22 日, JACAR『支那要人消息雑纂 第一卷』(B02031668100), 第 6 拍。
- 20 「機密第 223 号・医学博士黄丙丁ニ対シ日本病院視察費補給方稟請ノ件」1936 年 5 月 27 日, JACAR『医学博士 黄丙丁』(B05015769900), 第 7 拍。
- 21 前掲《郁达夫的星洲三年》, 蒋增福编《众说郁达夫》, 第 356 頁。
- 22 于听著:《郁达夫风雨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 年, 第 172 頁。
- 23 「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林課長殿」1935 年 12 月 16 日, JACAR『福建省立病院ニ対シ「レントゲン」機械寄贈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一年七月 昭和十二年』(B05016045200), 第 2 拍。
- 24 「在福州中村総領事殿」1936 年 3 月 4 日, 同上注, 第 12 拍。

- 25 「文化第二課課長宮崎申郎殿」1936年7月8日、『医学博士 黄丙丁』，第19拍。
- 26 「公第396号・中国人ニ対スル視察費補給ニ関スル件」1936年10月20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35拍。
- 27 「福建省立病院ニ対シ「レントゲン」機械寄贈方ノ件」1936年12月8日、『福建省立病院ニ対シ「レントゲン」機械寄贈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一年七月 昭和十二年』，第15拍。
- 28 前掲『福建省立病院ニ対シ「レントゲン」機械寄贈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一年七月 昭和十二年』，第1-122拍。
- 29 『「レントゲン」発生装置及附属品売買契約解除方ノ件 昭和十三年七月』（B05016045300），1938年7月21日，第1-24拍。
- 30 「外秘第3002号・中華留日学生講演会ニ於ケル郁達夫ノ反日講演ニ関スル件」1936年12月4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17拍。
- 31 郁達夫：《从鹿圈传来的消息》，《郁达夫全集》第6卷，第260页。
- 32 蔡圣焜：《忆郁达夫先生在福建》，《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第1463页。
- 33 「黄丙丁ヲ特選留學生ニ選定ノ件高裁案」1932年2月27日，JACAR『昭和七年度特選留學生選定』（B05015515200），第2拍。
- 34 「外秘第2900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並ニ医学視察ト称スル中国人医師ノ動静ニ関スル件」，1936年11月26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33拍。
- 35 「医学博士黄丙丁ニ対シ便宜與ノ件」，此类介绍信分别于1936年11月16日、18日，12月1日、2日开过四次，参照『医学博士 黄丙丁』，第8-13拍。
- 36 前掲「機密第223号」，『医学博士 黄丙丁』，第7拍。
- 37 「郁達夫ニ対シ便宜供與ノ件」1936年11月30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23—24拍。
- 38 「外秘第3158号・文化視察ト称スル中国左翼作家並ニ医学視察ト称スル中国人医師ノ動静並ニ退京ニ関スル件」，1936年12月22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38拍。
- 39 「片山歟夫様・富川辰夫様」1937年1月2日，『福建省立病院ニ対シ「レントゲン」機械寄贈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一年七月 昭和十二年』，第77拍。
- 40 前掲《郁达夫的星洲三年》，蒋增福编《众说郁达夫》，第356页。
- 41 前掲《平生杂记》，《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第1408页。
- 42 《大公报》1936年10月，引自孙百刚《郁达夫外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3页。
- 43 前掲孙百刚《郁达夫外传》，第73页。
- 44 一户务：「来朝中の郁達夫（上）」，『時事新報』，1936年12月8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26拍。
- 45 前掲「機密第158号」，『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9拍。
- 46 「電送第6896号・支那学者郁達夫ニ対シ本邦視察手当補給ニ関スル件」1936年5月8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7拍。
- 47 「対支文化事業講演視察費ニ関スル件」1936年3月5日，JACAR『満支人ニ対スル講演視察費補給ニ関スル件 昭和十一年三月』（B05015655900），第18拍。
- 48 久米雄雄編：『賃金長期系列50年——日本賃金50年の歩み』，産業労働出版協会，1988年，第647页。
- 49 郭沫若：《达夫来访》，《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409-410页。
- 50 「支那学者郁達夫ニ対シ本邦視察手当補給ニ関スル高裁案」1936年10月28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2拍。
- 51 参照「昭和十一年度講演及視察費調（昭和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現在）」、「昭和十一年度講演及視察費調（昭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調）」，JACAR『昭和十一年度 分割2』（B05015099700），第15、21、45、51拍。此处必须说明，在第21和51拍中，郁黄二人的费用均被列入“预计支出”栏内，此处有误，实为“已经支出”。理由有三：其一，此时郁黄二人早已回国；其二，与第15和45拍的财务列表一核对，二人费用恰在“已经支出”栏内；其三，每个款项都是“已经支出”与“预计支出”并列，后面为“差额”，但此处前两项均为“预计支出”，后为“差额”。因此，可以断定，郁黄二人领取了日本提供的补助金。
- 52 参见「支那学者郁達夫ニ対シ本邦視察手当補給ニ関スル高裁案」1936年10月28日，『支那学者 郁

- 達夫』，第2拍。『医学博士黄丙丁ニ対シ本邦視察手当補給ニ関スル高裁案』1936年11月4日，『医学博士 黄丙丁』，第2拍。
- 53 「外親第24415号・文化事業部招聘中国人渡来ノ件」1936年11月13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12拍。
- 54 以上日程参见监视报告「外秘第2900号」、「外秘第3062号」、「外秘第3002号」、「外秘第3158号」，『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30-40拍。
- 55 前掲『郁達夫資料総目録附年譜』（下），第261-262页。
- 56 前掲「機密第264号」，『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5拍。
- 57 「文化第二課課長宮崎申郎殿」1936年7月8日，『医学博士 黄丙丁』，第18拍。
- 58 「文化事業部宮崎申郎殿」1936年10月14日，『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11拍。
- 59 前掲『郁達夫資料総目録附年譜』（下），第261页。
- 60 日華学会編：《日華学会二十年史》，日華学会，1939年，第163页。
- 61 关于郁达夫此篇演讲稿的详细考察，参见拙稿《释读新发现的郁达夫访日时的“问题”演讲稿》，《多元文化》第10号（近刊）。
- 62 前掲「外秘第3002号」，『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16拍。
- 63 同上注，第18拍。
- 64 原载1936年12月20日日本『霞山会館講演』第39期，原题为「支那の現状に就て」，见《郁达夫全集》第8卷，孙百刚译，第256页。
- 65 《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309页。
- 66 前掲「外秘第3002号」，『支那学者 郁達夫』，第17-18拍。
- 67 郁达夫对《星光日报》记者赵璧所谈的访日感言。引自陈松溪：《郁达夫与福建抗日救亡运动》，《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6期。
- 68 郁达夫：《可忧虑的1937年》，《星光日报》，1937年1月1日，引自《郁达夫全集》第8卷，第261页。
- 69 高木特派员：「陷落前夜・狂乱の漢口（二）」，『読売新聞』（夕刊），1938年8月12日。

后记：

本文承蒙审稿人富山大学斋藤大纪教授和名古屋大学田村加代子教授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由衷地感谢。